

# 论唐人绝句的总集与选集

李 长 路

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，而绝句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绝句这种诗体短小精悍，只有四句，一般多为五言和七言，简名五绝和七绝；此外，六言、四言、三言，也有人尝试过。当然三言、四言除唐人（上官婉儿、吕岩等）外，此后就难以为继了。但五、七绝，则唐宋以来以至于今，作者盈千累万，佳作不计其数。我认为继承诗歌传统，借鉴前人遗产，唐人绝句也是重要的方面。

在谈唐人绝句的总集与选集以前，先简略地说一下绝句的起源与发展，绝、律间的关系，以及前人对唐人绝句的评价等。

隋末无名氏有诗“杨柳青青着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？”胡应麟（1551——1602）认为“至此七言绝句音律，始字字谐合，其语亦甚有唐味”。<sup>①</sup>他说王维的“春草年年绿，王孙归不归？”是学这诗的。这说明绝句来自民间，无名氏即民歌手，王维不过是学习民歌的一例罢了。据前人研究，绝句从汉魏六朝的古诗与歌行来，因此有古绝（五绝）

与律绝（七绝）之分。律诗未形成前，截自古诗“一解”（即一段）；律诗形成之后，又受其影响，讲平仄，甚至讲一点对仗，所以有人说是“截句”，截律诗的前半，或后半，或首尾二联，或中间二联（都是八句变四句，正好一半）。从内容诗意上讲，这是支解、割裂，讲不通；但从形式（平仄、对仗）上讲，这却不是全无根据的。中唐时白居易称绝句是“小律诗”，那是有意思的。总之汉魏六朝，从“垓下”歌起，即已有七绝的雏型了，五言短古那就更多。胡应麟认为早年的短古与歌行，“转换既迫，音调未舒。至唐诸子，一变而律吕铿锵，句格稳顺，语半于近体（律诗），而意味深长过之；节促于歌行（古诗），而咏叹悠永倍之，——遂为百代不易之体”。②“百代不移”这话当然说的过头，自有其时代局限性；但此体从此之后，通行千年，也是事实。王夫之也说绝句从五首歌行以来，唐人“演令充畅耳”。胡氏言前此“未舒”（或说未畅），与王氏言此后“充畅”，其说相合。

至于唐人绝句的成就，明杨慎（1488——1551）说过：绝句为“唐人偏长独至，而后人力追莫嗣者”。说“擅场（特长）则王江宁，偏至（独到）则李彰明，羽翼（助长）则刘中山，遗响（继承）则杜樊川；少陵（杜甫）虽号大家，不能兼美”。③他对王昌龄、李白、刘禹锡、杜牧四人，作为绝句能手而评价特高。胡应麟在学术上是反杨的，但对他这一段话，则认为杨慎“生平论诗，惟此精确”。王夫之特尊崇刘禹锡，号为“小诗之证圣”；我以为这正因为刘禹锡学习民歌最深，所以成就很大。不过，以上找了四位代表诗人，却还远不足以说明唐人绝句成就仅只有这几个人；有名的绝句诗人还要多得多。关于七言绝句，王世贞（1526——1590）说：“盛唐主气，而意不甚工；中、晚唐主意，而气不甚完。然各有至者，未可以时代优劣也”。④这话是突破

了专主盛唐的偏见，是中肯的。

关于唐人绝句的特点，明赵宦光说：“绝句大旨是已精而益求其精，已简而益求其简”；是“无言之言，若尽不尽”。<sup>⑤</sup>这话大致不差。他又说：“云绝妙之句，即非本旨，亦不大远其名”。<sup>⑥</sup>这在过去也是一种说法。

我们可以说，绝句在汉魏六朝已有雏型，或自成短歌（四句），或截长诗一解（四句为一解，等于说一段）；唐初律诗形成后，有形无形间受到律诗影响，貌似截律而成（唐宋以来编选绝句者即多有截律成绝之例），从古绝到律绝，有了个发展过程：其先是来自民间的民歌民谣；真正专攻而形成绝句一体者，则当断自唐代诗人们。

下面落到本文的主题，谈谈唐人绝句的总集和选集。总集可说是“向无善本”，选集也有局限。这里扼要谈谈这类书的优劣得失，对重编总集和选集问题提一点个人的建议，作为“一孔之见”，就正于读者。

（一）总集两种：

（1）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一百一卷 宋洪迈编

（原本百卷，四库本九十一卷）明德星堂刊本 七言七十五卷，五言二十五卷，六言一卷，目三卷，合一百一卷，为嘉靖中仿宋本（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）。

明嘉靖辛丑陈敬学刊本一百一卷

又，《唐人万首绝句》四十卷 宋洪迈编

明万历三十年刊本 赵宦光刻王士禛选本据此翻刻本（？）

( 2 ) 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四十卷 明赵宦光重编

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

先谈洪本。绝句的集成，始于南宋的洪迈（1123—1202）。书名《万首唐人绝句》，明清间也称《唐人万首绝句》，原是为南宋皇帝孝宗赵昚进御的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：“（洪）迈于淳熙间录唐五、七言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御，后复补辑，得满万首，为百卷，绍熙三年上之”。据说当时宋孝宗赵昚“褒嘉”，有“选择甚精，备见博洽”之谕。又“提要”还引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说其中多录宋人诗，还误入梁何逊诗。“提要”并引宋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，批评洪迈“但取唐人文集杂说，钞类成书，非必有所去取”。还指出“当时琐屑摭拾，以足万首之数，其不能精审，势所必然，无怪后人之排诋”。“提要”在另条中还指出洪书“务求盈数，踳驳至多”。又如把晚唐人王涣诗误收到王之涣名下等等。

其实洪书重要的误处，尚不止以上所指。主要问题是：失于“限断”，无所“诠次”；有遗漏，又有误收等等。就是说，唐以前的（六朝）或唐以后的（宋）不该收的都收进去了；而唐人的好诗却遗漏很多。如侯夫人原是隋宫人，而且其诗出于唐、宋小说《迷楼记》，原属后人虚构，都收进去了。而真正唐人如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仅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五绝《夜送赵纵》却漏收了，如此者极多（详见后文）。总之，不当收者多收了，应当收者漏收了。特别是全书由杜甫领先，真是毫无道理。

洪书以杜甫起头，是他最不得要领处。第一，以年次论，则初唐四杰王、杨、卢、骆和沈（佺期）、宋（之问）理应居前，更先的还有欧（阳询）、虞（世南）、褚（亮）、李（百药），而这些人排都在杜甫之后，有的人还给漏掉了，这已够乱的了。

第二，以创作数量论，即绝句的多产作家，和杜甫同时的李白，五、七绝近170首，比他多而且好。其他王昌龄80首，王维80首，也不为太少；特别中唐白居易绝句多达550首之多，刘禹锡近210首之多。杜甫绝句虽也有122首，但比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白是量少而质差，也轮不到他。第三，以质量论，李（白）、刘（禹锡）、二王（王维、王昌龄）、杜牧都是绝句能手，而杜甫虽称诗圣，律诗及其他体好诗尽多，绝句却非其所长。杜甫不善于绝句，前人多有所指（如杨慎、王世贞、胡应麟、王士禛等），当然也不是说杜甫没有两首比较可读的；但让杜甫在绝句上领头却真是毫无道理，误人不浅。

明赵宦光所以要重编洪书，就是不满意洪氏原著如上的错谬。他在《万首唐人绝句刊定题词》中也指出洪书之谬：

惜于尔时洪公旋录旋奏，略无论次：代不撮人，人不领什。或一章数见者有之，或彼作误此者有之，或律去首尾者有之，或折古一解者有之。至若人采七八而遗二三，或全未收录而家（诗人）并遗。若此注误，莫可胜纪。

清人如王士禛，也指出洪书“伪舛总杂”，说他把志怪小说之类“亦点简册，几于儿戏”。他并且指出“洪本字句或与今本（当指赵宦光重编本）异；然对校之，洪本不如今本者甚多，今从其善者，不必从宋本也。”（《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》）。

由此可见，洪氏的原编，错谬是较为严重的。

当然对洪书也要一分为二。洪迈是第一个編集绝句的人，除收了上万首的五、七绝句外，还收入六绝（这很少人注意），做为开路先锋，他的功不可泯。但事至今日，他的误谬显然，也是

事实俱在，无庸讳言。洪书明嘉靖间陈敬学刊本一百一卷，北京图书馆有藏本。

再谈赵宦光本。此即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四十卷本，是明万历年间赵宦光（1559——1625）重编洪书刊行的新编本，并有日本刊本。上有赵宦光的《题词》（序文）与黄习远的跋文。据黄跋：洪书“始于杜少陵，终于薛书记，时代先后不复詮次（是“无所限断”同义语）；而收载重复，一人三、四见者有之”。又指出“太白圣于此体，亦遗其脍炙人口者十之二”。并指出其书张冠李戴者多人。于是赵、黄合作，万历甲辰（公元1604年）春日，“共芟其繆且复者共二百一十九首，补入四唐名公一百一人，遗诗共二百一十九首，总得一万四百七十七首。”<sup>⑦</sup>他们的原则是：“诗以人彙（汇），人以代次，厘为四十卷。”<sup>⑧</sup>这就是谁的诗就汇集到谁的名下，何时人就归在何时，以年代相次为顺序。这就秩然有序，有条不紊，眉目清晰多了。三年告成；万历三十五年写的跋，是公元1607年。

此书特点，是区分四唐，卷首载有《唐风四始考》，定出初唐为九十五年，盛唐三十五年，中唐七十年，晚唐七十一年。这虽然也难免机械、牵强，但以年相次，总算比较科学一些，系统一些，实际一些。这种敢于重编，勇于整理的积极精神，是非常可贵的。他们俩，对作家有了“限断”，对作品有了“詮次”，这比洪书草创时的杂乱无章，确实前进了一大步，是应给以好的评价的。明清之际赵本是比较通行的，故王氏称之为“今本”。

但是赵本也仍然有局限性，其缺点是时间定的过死，诗人世次也未必完全准确。有些作者因不易考定，而误定者也是有的。如诗人乞干著，赵书把他定在晚唐，这分明不对。此人虽然年不可考，但根据“唐人选唐诗”的选本还是可以考定下来的。查中

唐令狐楚（760——837）编辑的《御览诗》，就选有纥干著诗四首（王士禛的删节本收有一首）。这足可证明，他与令狐是同时人，只能在他生前，不会到他死后。该书所选诗全是中唐诗人之作，三十个诗人中没有晚唐诗人，纥干著是其中之一。此书据称刊定于令狐生前20年，纥干著只能早于编者，不可能活到晚唐时期。何况《御览诗》是唐元和年间进御给皇帝（唐宪宗李纯）的书，它应是高仲武《中兴闲气集》的续书。高书成书于公元796年，明言所选诗由至德迄大历末，比令狐书早了十多年，其中没有纥干著的作品，只在令狐的书中有他，这就可以断定他与令狐楚、张仲素等为同时人了。又，书名据陆游云：《御览诗》名《唐新诗》，一名《元和御览》，足见此书是元和当时新诗集，则纥干著为贞元、元和间人无疑了。在明朝没有考出来（误作晚唐人），到清代《全唐诗》，则索性把纥干著等人排到最后的“无考诗人”里去了。总之这只是一例，诗人排列失误者还有不少，如把侯夫人仍列进去而不加以说明等。至于作者小传，必要的注解都没有，都是缺陷。这点，《全唐诗》还比较好一些，作者小传、必要的校注都有。还有，就是五、七言分卷，六言附入五言中，帝王领先，僧道妇女与鬼仙附后，则又是封建时代古书的一般通病了。

## （二）选本一种

### 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七卷 清王士禛编

有下列四种版本：

（1）渔洋全集本

（2）康熙洪氏松花屋刊本

（3）光绪丁酉金陵书局刊本 扬州局刊本

（4）上海涵芬楼仿古活字印本（即192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）。

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七卷，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（1634—1711）根据宋洪迈《唐人万首绝句》四十卷、明万历三十五年刊本选编的。他“病原著芜杂”，为删存八百九十五首而成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。其选本总结了前人简陋的选本，再删削洪书编选而成，是个较好的选本。全书五言作者百人，七言作者约一百七十人（有无名氏作品，但极少）。这书一般把上引各书的错误、缺点都纠正了。在艺术技巧上，相对来说，所选都是够水平的，在过去不失为好选本，“四库全书”已收。

此书唯一缺点是洪本遗漏的好诗，为赵本所增补的，他一首也没入选。他明知“洪本虽云万首，而颇有遗漏，赵补入者多”，却硬着头皮“今补诗概未及收，祇从元本”，这就不足为训。此人好为人师，喜删人诗。如他编的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，有不少的好诗和诗人，都被他刊落了。因此，洪书“颇有遗漏”，他自己也跟着“遗漏”了。编排顺序他跟从赵本是好的；而遗漏诗人好诗，这就不如赵宦光、黄习远高明了。

此外涉及到唐人绝句的唐诗选本有很多，如《唐诗三百首》及其《续编》等等，因不是专选绝句，这里存而不论。唯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》的绝句《凡例》，可以引来补充明人的评论。沈德潜（1673—1769）说：“五言绝句，右丞（王维）之自然，太白之高妙，苏州（韦应物）之古澹，纯是化机（化机应作环境解），不关人力。他如崔颢《长干曲》，金昌绪《春怨》，王建《新嫁娘》，张祜《宫词》等篇，虽非专家，亦称绝调”。他又说：“七言绝句，贵言微旨远，语浅情深，如清庙之瑟，一倡而三叹，有遗音者矣。开元之时，龙标（王昌龄）、供奉（李白），允称神品。此外，高（适）、岑（参）起激壮之音，右丞（王维）多凄惋之调，以至‘蒲桃美酒’之词，‘黄河远上’之曲，皆擅场也。后李庶子（贺）、刘宾客（禹锡）、杜司勋（牧）、李樊南



少选为宜。

四、不论总集选集，必要的注释和作者小传都可附加，如《全唐诗》之例，但不宜过细。

五、原书有关序跋，总集自然要予以附录。前人各种有关资料，也可考虑附入，使成完本，优于前代。

以上对总集与选集一般都是适用的，尤其是总集。当然，选集除上述共同的原则外，还应有其本身的原则，作为“凡例”的基础。

至于选集的详细条目，如对思想内容上的要求，艺术技巧上的选择，音韵声调上的处理；如何使选诗与现实结合，如何同语言规范化相配合，以及如何朗诵古诗词等等，因问题牵涉范围较广，可作为专题研究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。

1979年8月6日作

1979年9月26日校定

## 注释

①②引自胡应麟《诗薮》。

③杨慎语转引自《诗薮》及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。

④王世贞语转引自《诗薮》及《唐音癸签》。

⑤⑥俱见赵本《万首唐人绝句·刊定题词》。

⑦⑧俱见赵本《万首唐人绝句·跋》。